本书是唐长孺晚年的总结之作。在本书出版后不到两年，作者辞世。所谓，三论，即“论魏晋时期的变化”、“论南北朝的差异”、“论唐代的变化”。作者的关注点主要在社会经济、军事制度、士族门阀，并旁及思想文化。全书各部分之间联系不算紧密，只是作者以系统的方式，而非论文集合，将自己的史学积累集中于一书之中。初读来看，作者的行文、研究风格是平实近人的，虽没有什么特别深刻、有洞察力的判断，但大部分的观点证据比较扎实，读起来也没有隔阂，这大概是为何有的人更偏爱作者的文字而非陈鹤寿了。

不过也因为作者研究平实的特性，本书的大部分内容，主要是就笔者曾在其他书上曾看到过的内容的加深，或是用其他的证据加以解释，如魏晋门阀制度便在田余庆的《东晋门阀政治》中有详细的论述；南北朝的差异，《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也有涉及；社会经济的变化问题，当代的研究当然在综合性上做得更好，如万志英的《剑桥中国经济史》。而思想文化方面，作者也自陈其对于佛道了解不足，而对文化思想史的其他层面，作者的介绍也比较简略，不涉及深层。因而，总的来说，如果不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读者，且对这一段历史已经通过其他著作有了了解，未必需要阅读本书。但若是研究者，了解作者所使用的论证方法、史料，以及一些历史判断的细微差别，还是有所裨益的。

先谈一谈笔者读到的一些“新鲜”（这是就笔者的浅陋无知而言的）观点。作者提到，南齐时，有关商业税征收的记载中，出现了一种前史所未载的包税制，按作者的意思，大概包税制的出现这是史料中第一次。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，包税制一直是一种常用的征税手段，也是罗马中央-地方关系的重要中间人，但中国的史料中，包税人的存在似乎不算重要，到了元朝才有广泛的记载。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，颇可值得玩味，是否关乎到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，还是与文化差异有关，或可作为有价值的论题一探究竟。

关于军事制度的问题，也可值得提及。作者认为魏晋时期的主要趋势是，兵士的身份变得卑微化，南朝接续了这一趋势，但北朝由于游牧民族的习性，军士地位较高，后来唐朝主要继承的是北朝以来发展的军事传统。概括唐代军事制度，最重要的变化是从征发制到召募制，与之相应的是番上义务兵变为职业雇佣兵，表现为府兵制的破坏以及兵募征发制的破坏。

本书中最有争议的一点，也可能是作者本人时常在文献综述中出现的重要原因，为作者所提出的魏晋时期封建论。作者的大意是，汉代的中国仍属于奴隶制社会，这一论断的依据是汉代有关奴婢的记载很多，因而推测奴婢占人口的比例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。到了魏晋，出现了“地主作为土地所有者对佃农进行地租剥削，和地主对佃农具有一定的人身占有关系”，于是中国进入了封建时代。

关于奴隶制的问题，这里不必多谈，实际上中国从商代以来是否存在过古希腊、罗马意义上的奴隶社会都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，非斯大林-马克思主义（特指受到《联共党史》五阶段论影响的人）学者倾向于持否定的意见，就更不要说汉代是否是奴隶制的问题了。而作者关于封建制的定义，无论是与中国传统的“封建制”，还是西欧中世纪的“封建制”都不相同，比较之下稍微接近于后者。这里又遇到一个滑稽而又吊诡的结论，作者在论述魏晋进入封建制时，基本上是在论述一个衰退的、倾颓的变化，这显然与“五阶段论”所要求的“进步观”相违背，而且在作者的笔下，“封建制”看不出一点比前代进步的地方。最后，到了隋唐时代，作者可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将其“封建论”放到进步的时代中来论述了，只好偶尔无力的重复“封建”的说法，却已经不知所言何意。如果换一个环境，作者可能未必会这么说，“在镣铐下跳舞”的说法，应该是不错的。